

战后日本核政策的 建构主义分析^{*}

赵 宏

内容提要：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核政策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从坚持“无核三原则”到在核问题上政策立场与实际运作相当矛盾。对于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传统的分析存在着缺陷。本文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发现这一变化是伴随着日本对自身身份认同从“核武器唯一受害者”到“普通国家”的变化而演变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是日本核政策调整的原因。身份认同是通过国内、国际因素共同构建的。

关键词：日本核政策 “受害者”身份 “普通国家”身份

1945年8月，为敦促日本投降，美国将当时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日本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伤害的国家。这种“受害者”的地位，对于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认识、情感的形成，以及核政策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7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首次提出了“无核三原则”，与和平宪法一起，成为日本的立国之本和“国是”。然而，在战后几十年间，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与实际运作过程有相当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日本时时以唯一一个遭受核武器攻击的

国家的身份要求核不扩散、反对核试验；另一方面，日本核能力的发展现状令世人瞩目，政府高官不断发出发展核武器的试探。未来日本的核政策向何处去？鉴于日本的侵略历史，更因为事关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核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对于日本核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彬教授、刘江永教授给予了大力的指导，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做出了研究。他们认为,日本核武器的发展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持续衰退的日本经济不但没有影响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进程,反而迈向军事大国的步伐更大、更快。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威胁的日趋多元化给日本提供了摆脱束缚的契机,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每一次军事动向和变革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首先,日本当局感到朝鲜半岛局势对其构成了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特别是朝核危机再度发生,使日本的威胁感进一步增加。其次,近年来,日本当局对中国的担心日益突出,自1992年以来,日本《防卫白皮书》一直把中国作为重点防卫对象,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此外,日本还感到自己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面临诸多威胁。但有学者认为,过去30多年来,国际权力平衡发生的变化与日本的安全概念并没有明显的联系。还有学者将其归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认为日本存在着民族利己主义、对弱于自己的国家持民族优越感,以及日本人往往因为忠诚而陷入狂热的民族劣根性。

以上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日本核问题提供了诸多的角度和背景。那么,21世纪日本是否会跨越“核门槛”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技术能力、经济实力、国际环境、日本国内社会对发展核武器的反对程度。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各个因素对日本核武器发展的制约作用,以确定更加合理的理论解释,并由此对日本未来核政策走向做出预测。

一、日本完全具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

对于日本目前的核技术能力,一些学者已经在文章中有所提及。比较公认的见解是:日本拥有先进全面的核技术,在增殖反应堆、核聚变、计算机模拟核爆能力、新的核原料获取等核技术的前沿领域的领先地位是举世公认的;核弹头运载工具技术在上是居于领先水平;拥有惊人的核原料储备,预计到2010年钚的储备可达100吨;日本不少政客所声称的183天造出原子弹的高调并非只是虚张声势。这些研究确实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核能力的现状和潜在的可能。

俄罗斯《消息报》认为,在日本如此迅猛的核工业发展势头面前,谁也不敢肯定将来日本不会涉足核武器。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发达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只要形势需要,日本作出建立核武装的决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一跃成为世界第三个核大国。

从以上材料来看,日本的核武潜力十分巨大,而且由于技术先进,转化实现核弹的能力很强,是否制造和拥有核武器完全取决

姚文礼:《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载《安全与战略》,2004年第3期,第51页。

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赵恒:《日本核政策的回顾与前瞻》,载《日本研究》,2003年第2期,第52页。

唐堂:《警惕!日本危险的核潜力》,载《解放军报》,2000年6月23日。

于非技术和经济、政治等因素。

二、国际环境制约作用弱化

长期以来,美国对日本在军事上,尤其是核领域,实行高压政策,使得日本不得不在这方面采取低姿态。但是,近些年来,美国开始在军事领域纵容和鼓励日本,例如《新日美安保条约》显示日本要“积极参与周边事务”,日本还积极与美国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甚至在2003年初,美国有人主张“容忍日本核武装”来对抗朝鲜的核发展。况且,美国的对外政策一向奉行双重标准。就朝核危机而言,朝鲜并无独立建造核反应堆的能力,其核反应堆是在前苏联援助下建造的。几座核反应堆的功率都不大,性能落后,难以支持朝鲜成为一个核大国。目前的情况是,朝鲜称自己拥有核武器,有些国家在猜测朝鲜是否真正拥有核武器,或者有多少?而相比之下,日本的核反应堆数量、技术水平、核原料的储备数量都远远高于朝鲜。特别是日本不惜重金建造的增殖反应堆,作为发电用途绝对不经济,唯一的好处是可以生产制造核弹的原料。如果是基于日本和朝鲜的核能力进行判断,那么无疑日本核问题要严重得多。在中东地区也是这样,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没有受到任何核查,而至今没有被查实拥有核武器的伊拉克却反复受到核查和军事打击。

此外,一旦一个国家走过核发展的脆弱期,国际压力就难以发挥作用(例如,印度、巴基斯坦)。由于日本经济和技术实力雄厚,走过这个脆弱期可能会很快。因此,我们不能高估国际因素的作用。

那么,在经济、技术和国际环境三个因素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日本国内社会对核发展会起到怎样的制约作用?这成为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

三、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战后日本核问题

卡赞斯坦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存在在那里让自私、理性的行为体去发现,而是通过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被建构,”主观性力量在决定国家行为的过程中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物质性力量对于国家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而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物质力量的作用,但更强调主观性力量巨大的独立作用。在此,建构主义特别强调:一个国家所持有的独特的身份认定是特定的国家利益的主要源头,它显示了一整套涉及特定的有关行为和有关行为者的利益抉择和偏好取向。举例来说,当一个欧洲国家具有“欧盟一员”的身份认定而非“大国”的身份认定时,两者会产生颇不同的国家利益取向,从而对该行为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以及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产生完全不同的

见《美部分保守派主张如果朝鲜有核武器日本也应发展核武器》,载[日]《朝日新闻》,2003年1月23日。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8, pp. 174 - 176. 转引自陈东晓:《浅议建构主义对东亚安全前景的再认识》,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4期,第30页。

影响。据此,建构主义理论提出了“独特的身份认定——利益——行为——变化”这样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路向。本文试图根据这一思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战后日本在核问题上的行为做出分析。

1. “战犯”和“受害者”的身份认定:明确反核的官方立场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把当时仅有的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到广岛和长崎,共造成死亡和失踪30.8万人,伤22万人的悲剧。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日本人深受其害。这种唯一一个遭到原子弹、氢弹伤害的国家的地位,给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认识和情感的形成以及日本核政策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观地讲,对核武器持厌恶、反感情绪的日本人的人数远远大于主张发展核武器的人数,这也是当时日本制订核政策的基础。二战结束后,日本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表达其爱好和平的意向,表示要与过去的军国主义告别。

1956年的《原子能基本法案》将日本的核研究、开发和使用限制在和平目的上,日本政府还从这一年开始声称要恪守“核三原则”,即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禁止日本生产核武器,禁止日本引进任何核武器。1967年12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议会众议院发表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被看成是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后来的历届政府也都表示要坚持这项原则。佐藤荣作也因其致力于反对核扩散和提倡“无核三原则”而荣获197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时,在政治上为日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在美国、苏联、英国主导下,1963年《部

分核禁试条约》(即PTBT),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即NPT)先后达成。1964年日本批准PTBT,1970年签署NPT,议会在1976年6月8日正式批准。事实上,日本一直是最积极支持PTBT和NPT的国家之一。1996年9月24日,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即CTBT)开放签署的当天,日本就加入了。“CTBT是日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日本公众对于核试验有着强烈的怨恨情绪。”1998年5月,印度、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后,日本对其进行了经济制裁。

1995年8月6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第50届广岛原子弹死难者慰灵及祈祷和平大会上表示,“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将恪守日本的和平宪法,放弃一切进行核武装的可能;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同时,忠实履行日本对防止核扩散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为销毁核武器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2000年8月6日,森喜朗首相在广岛又说:“人类历史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我国有坚定的决心,不使广岛、长崎的悲剧重演。在遵守日本国宪法、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同时,将继续向世界呼吁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和持久的和平。”由此可见,日本的官方立场是反核的。

2 向“普通国家”身份转变:成为“无核原则”下的有核国家

赵恒:《日本核政策的回顾与前瞻》,载《日本研究》,2003年第2期,第48页。

Yukiya Amano, “A Japanese view On Nuclear Disarmament”,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9, No. 1, 2002, p. 139.

《人民日报》,1995年8月7日,第6版。

同上。

冷战后,关于国家的未来走向问题在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分歧,即自由派倾向与保守派倾向之争。前者以“民生大国”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后者以“普通国家”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自由、自助、自决主义。近年来这场争论的倾向性日渐明晰。随着2003年5月15日有事法制相关法案以绝对优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场争论已经尘埃落定,“普通国家”战胜了“民生国家”。走“普通国家”之路已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力量的战略共识,并为21世纪日本外交、安全战略调整规定了根本方向。

在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眼里,世界环境已发生巨变,日本应抛开战争罪责留下的阴影,做一个能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像印巴等发展中国家都已拥有核武器,为什么日本不能。只要日本国民认可,日本也可放弃无核三原则而设法拥有核武器。它积极向国际社会推销其“普通国家”的政治理念,即主张打破国际禁忌,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恢复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包括交战权、海外出兵权、甚至拥有核武器等。“9·11”事件、朝核危机再起之后,日本积极出兵印度洋,配合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迫不及待地出台《反恐特别措施法》、“有事法制”等法案,其目的皆出于此。

那么,这种“普通国家”的政治理念是怎样被建构的呢?这包括国际、国内两方面的作用。

从国际因素来看,主要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美国越来越认为对美国

全球势力的重大挑战可能出现在亚洲,并把中国作为美国在亚洲安全问题上考虑的重点。为了推进其在亚洲的安全战略目标,美国急需日本在军事上给予更大程度的支持、配合和参与。有鉴于此,布什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积极提升日本战略地位,把日本作为21世纪消除恐怖主义、制衡中国和促进亚洲在美国主导下的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美国多次表示支持日本调整其安全战略,并认为必须继续鼓励日本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从日本国内形势变化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陷入了严重困境。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认为:“如今日本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中。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泡沫均已破灭。政治泡沫表现为接连出现短命内阁,经济泡沫的破灭暴露了日本‘护送船队’方式的缺陷,社会泡沫的破灭则体现在犯罪案件激增和教育状况恶化方面。”危机导致了日本国民自信心的下降,使得国民心理加速由自信向自危的方向转变,民众对强硬政权的期望更加强烈。同时,强烈的危机意识也促使国内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社会上保守主义思潮泛滥,右翼势力市场扩大。这也是日本“普通国家”思想出台的重要动因。

在“普通国家”理念的鼓舞下,日本政府的高官不断发出核武试探。2002年5月,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和长官福田康夫先后发表讲话,安倍声称,“日本宪法允许它有‘小型的’自卫所需要的核武

姚文礼:《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载《安全与战略》,2004年第3期,第53页。

器”。福田说,“如果国际形势恶化,有些国民或许认为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他甚至说,“有必要的話,可以修改‘无核三原则’”。2004年4月,日本《呼声》月刊4月号刊登了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名誉所长、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文章,题为《21世纪的国防战略》,其中写道:“如果仅限于保卫本国,日本拥有小型核武器就不违反宪法。美国国会也允许研究此事。为了提高日本在万一情况下的防卫能力,宪法要允许日本拥有小型核武器。”日本一名政治分析家指出:“日本政治家有意无意的谈话虽然都在其后进行‘纠正’或‘收回’,但这些谈话都表示他们内部具备这些条件或已经作好有关准备。这实质上是在投石问路,打探虚实,看国际社会如何反应,以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另外,日本长崎大学前校长土山秀夫认为:政府不会无缘无故抛出有关核武器的谈话。“出现这样的讲话显示政府内部从未中断过拥有核武器的愿望。”他指出,“这次发言纯粹是一种试探,是为了要让国民习惯‘拥有核武’的声音。”

日本政府内主流意见对核武装持慎重态度。外务省高官认为日本核武装将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代价太大”。大部分外交人员认为,关于核武装的议论本身就会使日本军控外交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此外,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批评说:“决不能容许以像是进行单纯的表面上的法理解释的话语来刺激因核武器而受到了伤害的人们的心。社民党干事长福岛指出:“这是无视以往的议论的十分危险的讲话。”共产党的笔坂秀世表示“将把该讲话作为重大问题加以追究。”即便是在执政党内部,

也出现了批评福田讲话的不同声音。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说:“政府高官为什么会讲出这种居心叵测的话?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子子孙孙坚持和平宪法和无核三原则是我国的根本,必须慎重行事。”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明确指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是。这一点今后也不应改变。”6月1日起,广岛80多名核爆炸受害者和市民开始在和平纪念公园静坐,呼吁日本政府正视现实,在和平宪法及“无核三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外交,为建设和平社会做出努力。广岛原子弹爆炸被害者团体协议会的代表坪井直表示,不仅是被害者,即使从人类和平角度考虑,福田的言论也是“坚决不允许的。而“实现非核政府长崎县民之会”的民间团体则于当天郑重向小泉首相和福田递交了抗议书。

由此可见,虽然日本已经具备了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实力,所谓“核门槛”对它来说只是一层窗户纸,但是日本的政策制定过程十分复杂。政策的推出都是政府行政政治、国会政治、精英协调政治、公共舆论政治等不同的政治类型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的结果。目前,无论是日本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见,还是广大日本国民均对核武装论持谨

《中曾根阐述 21世纪日本应如何走向自主的国防战略》,载《参考资料》,2004年4月8日,第27页。

胡学兵:《警惕:日本启动核战车》, <http://www.peopledaily.edu.cn/CB/junshi/62/20020611/749766.html>

《政府人士大多对核武装持否定态度》,载《日》(朝日新闻),2003年8月7日。

Minoru Nakano, *The Policy - Making Process in Contemporary Japan* (Macmillan Press and ST.Martin's Press, 1997), pp. 64 - 98.

慎的态度。权力制衡机制不允许行政当局随心所欲。何况,和平宪法的存在本身也有巨大的牵制作用,因为依照日本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需要众参两院 2/3 以上的赞成,在此基础上由国会向民众提议进行全民公决。尽管 2003 年 5 月“有事法制三法案”通过后,小泉首相宣称这对现行法律做出的改变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但在国内外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还一时难以得逞。

结 论

从“受害者”到“普通国家”(甚至是“政治、军事大国”)身份认定的转变,使日本的核政策与实际行为具有相当的矛盾之处。一方面,迫于国际国内压力,不公然抛弃“无核三原则”的官方立场;另一方面,不时出现“核武装论”言论,大肆渲染朝鲜、中国的威胁,表明日本存在谋求获取核武器的要求。武力不能防止战争,只能招致战争,这是历史的教训。遵循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才是开辟和平道路的途径。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和国民安全观念的变化,仅仅依靠日本国内和平、护宪、反战的力量,已经很难遏止日本政治外交的总体右倾化和走向军事大国的战略意图。

尽管如此,短期内日本不会走向核武化。从国际角度讲,当前的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可以有效借助和利用的工具,即在美国的战略架构内,扩充军备、出兵海外、修订防卫战略、摆脱法律制约,最终实现军事政治大国之梦。正如中曾根康弘所说:“今后如何对待《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关系到日

本要不要拥有核武器的问题……至少在继续保持目前形势的状况下,依靠美国的核武器保护是上策。绝对应当采取避免由日本引起火种的行动。”从国内角度讲,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核武器受害者,日本国内社会对核发展的反对态度十分强烈。日本国民是战后日本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受益者,和平主义在国民中仍有较大的影响力。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90 年代中期,日本先后进行了两次关于核政策的研究,结论都是对核武装持否定态度,认为依赖美国的核威慑是日本的最佳选择。但是,即使因为国内外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一时难以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日本政府也会继续对现行法律进行“扩大解释”,在不打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情况下,以“少说多做”的方式加快实现其成为“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

从长期来看,进入 21 世纪的日本人民对于战争的记忆、寻求和平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于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渴望愈加迫切,不仅要显示其经济实力,而且要显示其政治军事的强国地位。在日本政坛上,“保守合流”的政治动向也不仅使力量对比对传统革新阵营更加不利,而且可能加强日本政界和社会的总体保守化。随着日本舆论和民众心理发生变化,和平主义的影响减弱,日本的未来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的忧虑和强烈警惕。

作者简介:赵宏,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2003 级硕士生。北京,邮编:100084

《中曾根康弘阐述 21 世纪日本应如何走向自主的国防战略》,载《参考资料》,2004 年 4 月 8 日,第 27 页。